

那些被文字点亮的父亲

朱自清的记忆里，父亲臃肿的背影让他难忘。父亲笨拙地爬上浦口火车站的月台，怀中紧捂的橘子如一团微火。父亲的蹒跚身影，成了中国文学里最蚀骨的画面。这抹被时光拉长的剪影，映照出千万个父亲的模样。

那些文学长卷里的父亲，总以不同姿态点亮同一盏灯。灯光或疏朗如星，或温润如月，穿透时光的帷幔，将生命的荒径照彻。

汪曾祺记忆里的父亲汪菊生，是盏别致的灯。

当别的父亲板着脸训诫“早恋猛于虎”时，这位被姑妈戏称为“孩子头”的父亲，却为写情书的儿子“瞎出主意”。他给少年汪曾祺斟酒——“他喝酒，给我也倒一杯”。这一刻，威严的父子纲常被悄然揉碎，凝成一句箴言：“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儿女的前路，他恪守“闻而不问”的哲学，任其如野草般自由生长。

丰子恺自身便是那盏有着童真的灯。作为7个孩子的父亲，孩子的嬉闹喧哗，落在他耳中，便是人间至美的天籁。他曾在散文里坦言，看着儿女长大，既欣慰又怅然，因为那份纯粹的童真终将融入世故的洪流。

这份对童真的珍视，化作他画笔下流淌的温情。

《阿宝赤膊》等为儿女所作的漫画，没有一丝说教，只在妙趣横生的线条间，将平等、尊重与赤子之心悄然播撒。小女儿丰一吟忆起父亲教他们唱《送别》，唱到“知交半零落”的感伤处，他会忽然笑着改

词：“星期天，天气晴，大家去游春……”他用画笔和歌声，在儿女心田筑起一座抵御世故的堡垒，他自己便是最温柔的守护者。

少年时，莫言被父亲的目光刺得生疼：“似乎永远板着脸”，那严厉在高密东北乡是出了名的。叛逆的少年只要听见一句“你爹来了”，便“打一个寒战，脖子紧缩，盯着自己的脚尖，半天才能回过神来”。多年后，母亲揭开真相：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父亲，唯恐孩子行差踏错，只能以冷硬为铠甲。冰封的严厉下，是灼热的守护。那铁尺般的规训，原是贫瘠土壤里长出的荆棘篱墙。

梁晓声记忆中的父亲，像北国冻土上倔强生长的铁杉。滂沱雨幕中，父亲的脊梁弯成一张硬弓，汗与雨在脖颈间汇成生命溪流。这位以砌墙垒筑人生的建筑工人，将“觉得苦吗？嚼嚼咽了”八个字，如混凝土般夯入儿子灵魂的地基。多年后，《人世间》里的周秉昆，筋骨里奔涌的正是这般“垦地打井，房顶开门”的硬气和不求人的傲骨，咽下苦难的沉默，恰是文学对父性最锋利的镌刻。

孙犁笔下的父亲像一册朴拙端正的古帖。父亲在店铺库房睡了40年，每年正月十五才能踏上归途。小孙犁常坐在接父亲的牛车上，看着父亲每过一个村庄，必下车与街坊拱手寒暄，人人敬唤一声“孙掌柜”。这份旧派商人的厚道与风骨，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，成为儿子文学品格中最坚实的

磐石。

无声处的烙印，往往最深最沉。茅盾的父亲在弥留之际，于病榻前强撑病体，以几卷发黄的启蒙读物为幼子启蒙。油灯摇曳，微弱的灯光映着父亲枯槁的面容和嘶哑断续的诵读。那专注与无力交织的剪影，自此成为作家一生敬畏文字的源头活水。

然而岁月无情，终将吹熄父爱的灯盏。孙犁奔回故土时，父亲坟头荒草齐腰，那位正月十五驾牛车归家的“孙掌柜”，终湮没于离乱烽烟。

迟子建的《灯祭》里，父亲是风雪中佝偻的制灯人，用捡来的罐头瓶为女儿做一盏灯。而当他猝然长逝，留给世界的只剩“那灯守着他，虽灭犹燃”。每一盏父爱的灯，都曾照亮生命最初的径，纵使熄灭，光的余温也已渗入土地。

灯的意义不在炫目，而在守候。当万千灯火渐次亮起，总有一盏以你的名字为芯。它或朴素，或炽烈，却始终映照同一种温暖。天涯倦客的归途，原来从未离开过父亲凝视的半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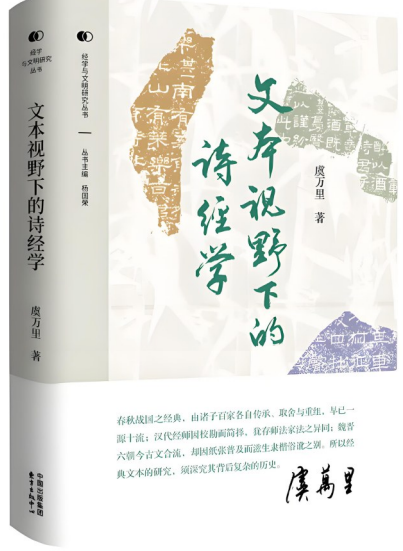
（据《陕西日报》）



荐 读



《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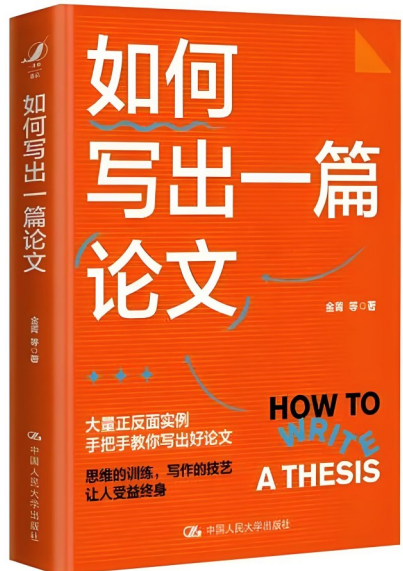


作 者：虞万里
出版社：东方出版中心

全书以传世《诗经》文本为主，参证清人学术成果，兼取出土安大简、阜阳简、上博简、海昏侯简和熹平石经《鲁诗》残石所作的研究。书中每篇都指向一个不同的研究路径，是作者在长期研究先秦经传演变形态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《诗经》文本的思考。



《如何写出一篇论文》



作 者：金 菁
出版社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论文写作能力是一项极具实用性的硬核本领。如何进行“有逻辑的说服”？书中不仅介绍了论文的基本结构、论文选题的确定等内容，还尝试向读者展现推理方式和思维工具，意在帮助读者不是在越来越细分的学科领域中切割自身以求适配，而是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基础上形成问题意识和探寻能力。

向苏轼学“调研”

不轻信“道听途说”。当庙里的和尚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，让小童拿着斧头，“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，硃硃焉”，苏轼的态度依然是“余固笑而不信也”。而当突然听到巨大的水声，船夫受到惊吓时，苏轼不仅没有退却，反而“徐而察之”，更加认真仔细地观察。

要选择时机，找对方法，不要无的放矢、闭门造车。

虽然不知道石钟山因何得名，但大概率是因为钟声，调查的重点应放在声音上。夜深人静、万籁俱寂之际，独特的声音最容易寻找，苏轼在“调研”时机上选择了“暮夜月明”之际。水与石是石钟山的两大景观，苏轼在“调研”方法上选择了“乘小舟，至绝壁下”。在“调研”过程中，苏轼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老鹰、鸛鹤的鸣叫和水流响动等声音上，最终发现“有大石当中流”，探得“空中而多窍，与风水相吞吐”的真相。

得知真相后，苏轼发出“事不目见耳闻，而臆断其有无，可乎”的

感慨，在“盖叹郦元之简，而笑李渤之陋也”之后，用文章记下这一事情，警示后人。

苏轼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，也是一个勤政为民的官员，有着“享天下之利者，任天下之患；居天下之乐者，同天下之忧”的情怀。他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不仅体现在文章中，还体现在实践中。

苏轼在颍州为官时，一些地方官吏为治理水患，想开挖八丈沟。苏轼为此赶到实地进行深入“调研”，发现开挖八丈沟不仅不能解决黄淮一带的水患，还可能导致淮河倒灌。他就此写了《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》，最终使朝廷取消了这项劳民伤财、有害无益的工程。

通过《石钟山记》，苏轼不仅让人们感受到文学之美，还为人们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态度、宝贵的经验、科学的方法。即使在今天，这些经验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

（据《陕西日报》）

警 惕

常谈崩。

“因为”与“所以”有时不构成逻辑关系。想而不能、爱而不得才是常态，不能“因为你”喜欢，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据为己有，不能“因为你”讨厌，就理所当然地去贬低，也不能“因为你”比别人优秀，就理所当然地轻蔑他人的努力。很多时候“因为”跟“所以”大路通天各走一边。

“虽然”与“但是”也可能风马牛不相及。天气冷到非常人能忍受，为什么还得硬撑着白白受苦受累？这件事很难解决是铁定的事实，你再相信人定胜天也会无能为力。一次失败可能已将你摔得七零八散，哪会很快就意志坚定地卷土

重来？“虽然”常常压垮好不容易撑起来的“但是”。

“即使”与“也”未必合拍。发着高烧生病了就得去医院，为什么还要硬撑着去做别的事？家里不富裕就应该同甘共苦，为什么大人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摆出“王子”“公主”的架势？大家都反对时，可能真的有问题，干嘛不停下来反思而一意孤行？遇事先解决好“即使”面临的情况，不用太着急“也”的事情。

我们究竟是应该警惕关联词，还是应该警惕乱用关联词的人？关联词的构建本身没有问题，但一些不合逻辑的使用，却暗含道德绑架。

（据《今晚报》）

做只萤火虫也挺好

小时候，夏夜，在院子里乘凉，家门前的一只只萤火虫飞来飞去。一会飞到树下，一会飞到空中，一会飞向稻田，一闪一闪的光亮，虽是微弱，却明亮光净。

很多时间，仰望天空，用心尽力，希望能像一颗星星、一轮明月，光芒璀璨。但岁月如梭，发现自己依然渺小，如萤火虫般。

韩少功在《人生忽然》中说：“当了太阳的人，当一只萤火虫也许恰逢其时。”生活困难，依然向阳、努力了不一定有所回报，但不努力，一定不会有收获。尽管前方迷茫，仍倔强摆动着自己的尾巴，发着微弱的光，朝着前方未知的领域飞去。

一点一点的光芒，给家人的光芒，给亲友的光芒，给服务对象的光芒……虽然不能照耀整个山川、河流、大地，但是朴实的、无华的，是内心的从容与坚定，一石一砖垒起自己的江山，一点一滴照耀自己的星河。

生命的本质不是财富的多少，贡献的多少，更多的是一场体验。

在车水马龙中穿梭，习惯了风吹雨打日晒，每天重复着劳动，日复一日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，没有人生得意之笔，有时也会无能为力。太阳总会升起，希望依旧在。做只小小的萤火虫，努力照亮前行的路。（据《羊城晚报》）

扎根民间文艺的创新沃土

新大众文艺的基本特征是大众创作、大众共享，这与民间文艺具有天然的同构性。当前，科技变革加速，传播媒介多元，海量民间文艺创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，其参与人群、生产方式和创作成果都呈现诸多新貌。

人，是新的。一方面，传统手工艺人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民间艺术家、网红博主，非遗传承人，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创作者在国内外掀起传统文化热潮。另一方面，高学历人才成为民间文艺新生力量，北京“面人郎”郎佳子彧、道明竹编杨隆梅、苏绣姚兰等一批青年才俊，从各行各业奔赴民间文艺。

艺，是新的。在创作目的上，民间文艺越来越面向文化消费需求而非“闭门造车”；在内容上，不断突破地域风格并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；在创作组织上，“传承人+企业”“企业+农户”等方式聚合起不同主体的创新力量。

传播，是新的。口碑相传变为触达手机屏幕的融媒传播，来自创意设计公司和新媒体平台的支持，也为民间文艺的转化创新提供条件，促使民间文艺成为新大众文艺的“源代码”和文化创新的“IP库”。

新大众文艺和民间文艺，都让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角。一定程度上说，新大众文艺是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现象和结果。民间文艺将以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，为新大众文艺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。

（据《人民日报》）

李济受益于“放任”“启发”

李济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，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。

李济的早年教育，得益于父亲的开明与睿智。在一篇回忆早年教育的文章中，李济道出其父教育子女的两则基本信条：“他是孟子的信徒，笃信性善说。他同意孟子的‘人皆可以为尧舜’‘人皆可以为圣人’的说法，所以他教育青年子弟，注重启发……他对于教育子弟的第二信条，可以说是从第一条引申出来的，即：使每一个儿童发展他的善性，也就是充分地培植儿童固有的品质。他讲到：‘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’常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教材，把上说的两项意思反复地、巧譬善喻地解说得淋漓尽致。”

教育幼年的李济，父亲没有死板地循规蹈矩，也没有粗暴地拔苗助长，而是采用儿童们“喜闻乐见”的方式，激发他的兴趣，培植他固有的品质，重启发，不压制。

李济的父亲喜欢孟子，曾多次为李济讲解孟子的作品。李济入清华后，受老师影响开始攻读荀子。父亲知道荀子是孟子的对头，但他并未干涉儿子的阅读。对儿子兴趣的转移，父亲采取了“放任”的态度。对此，李济心存感激：“他的心中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大概也只是让我做自己的抉择，尽量地发挥自己的理性，这是与他的教育方法相符的。”

李济的早年教育受惠于父亲的“放任”与“启发”。

（据《今晚报》）

古诗文里赏牡丹

春深似海，烟雨迷蒙；桃李渐歇，芍药未醒。而庭前阶下，牡丹却灼灼如锦绣堆云，天天似霞光坠地，在百花沉寂时独领风骚。牡丹自《神农本草经》被尊为“花中之王”，便与盛世繁华相映相衬。它虽无寒梅的孤傲，亦无幽兰之清逸，却在诗画中绽放成人间绝色，三分富贵，七分浓烈。

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勺勺。”《诗经》中，写的不是牡丹，而是它的姊妹花芍药。牡丹真正地称霸诗坛，乃始于盛唐。沉香亭旁，杨贵妃霓裳羽衣舞动，李白醉中挥笔，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”，让牡丹从此浸染上大唐的华贵气息。刘禹锡感叹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徐凝也吟咏：“何人不爱牡丹花，占断城中好物华。”诗中牡丹如一面明镜，映出当年长安城内的盛世繁华。

牡丹天生喜爱暖阳，古人写诗赞颂它，常寄托对富贵繁华的感慨。白居易夜看牡丹凋零，写下“明朝风起应吹尽，夜惜衰红把火看”，将残花比作盛世落幕的叹息；晚唐皮日休目睹权贵争艳，借花讽道：“竞夸天下无双艳，独占人间第一香。”字里行间，满是王朝衰颓的哀凉。最绝的是李商隐的“我是梦中传彩笔，欲书花叶寄朝云”——晨露未干时，牡丹花瓣竟似彩笔绘就的书信，直寄天边的云霞。

对诗人而言，牡丹不仅是倾城美人，更是世道人心的写照。王维在辋川别墅种牡丹，描摹“绿艳闲且静，红衣浅复深”的恬淡画卷；罗隐见朱门攀比，冷笑“若教解语应倾国，任是无情亦动人”，暗讽人心虚浮；欧阳修编写《洛阳牡丹记》，细说“洛阳地脉花最宜，牡丹尤为天下奇”的典故；陆游晚年见牡丹盛开如雪，却想起“二十年前宴华堂”的往事——原来国色天香背后，深藏着人生起伏的悲歌。

古人妙笔写牡丹，将俗世繁华皆化作诗意。周敦颐独爱莲花，却写“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”，借此批评跟风逐利的不良风气；汤显祖让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，在“牡丹亭畔，芍药栏前”为情而死，人鬼痴恋与花影缠绵交织。徐渭画墨牡丹，自嘲“五十八年贫贱身，何曾妄念洛阳春”，潦倒文人偏要触礁富贵之花；蒲松龄在《聊斋》中写“葛巾”“玉版”两位牡丹花仙，雪白绛紫的花色里，藏着书生对美好的痴心妄想。

从武则天写诗催花“明朝游上苑，火急报春知”开始，牡丹便以绝世容颜，绣入中华文化的长卷。它是杨贵妃发间摇曳的金步摇，是李白醉后泼墨的紫毫笔；既盛开在《簪花仕女图》的丝绢上，也凋零于《长恨歌》的琵琶声里。千百年来，牡丹让锦上添色，妙令国色增香，两者相得益彰。如今游人驻足洛阳花海，那穿越千年的浓艳仍在眼底燃烧——它是唐代画师笔下的胭脂凝露，是敦煌壁画中的宝相庄严，更是中国人心中的盛世华章。（据《民主协商报》）

